

試用教材

中國共產黨歷史講義

第四章 黨在抗日戰爭時期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中共黨史教授會

1957. 2.

內 容 提 要

第一講 抗日戰爭爆發后的國內外政治形勢和 黨的洛川會議

- 一、抗日戰爭爆發后的國內外政治形勢
- 二、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形成
- 三、黨的洛川會議

第二講 為堅持全面抗戰、堅持統一戰綫中的 獨立自主而鬥爭

- 一、兩個戰場的兩種局面
- 二、民族投降主義和階級投降主義
- 三、毛澤東同志的“論持久戰”一書的發表。黨的
六屆六中全會

第三講 為粉碎國民黨的投降反共活動而鬥爭

(一)

- 一、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
- 二、毛澤東同志的“新民主主義論”一書。國民黨
第一次反共高潮的被擊退

第四講 為粉碎國民黨的投降反共活動而鬥爭

(二)

- 三、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中的鬥爭策略
- 四、皖南事變和國民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被擊退

第五講 整風運動和生產運動

- 一、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国抗战形势
- 二、党的整风运动
- 三、解放区的生产运动

第六讲 党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斗争

- 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展。国民党统治的腐朽和共产党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 二、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 三、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小结

第一講 抗日戰爭爆發后的國內外政治形勢和 黨的洛川會議

一、抗日戰爭爆發后的國內外政治形勢

1937年7月，日本帝國主義開始了對中國本部的大規模進攻（7月7日進攻北京以南蘆溝橋駐軍，8月13日進攻上海）。在此民族危亡關頭，全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日”的旗幟下，團結了起來，展開了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反抗鬥爭。從此開始了全國性的抗日戰爭。

日本帝國主義所實行的滅亡中國、獨霸東亞的侵略政策，侵害了全國各個階級的利益，同時也威脅到社會主義蘇聯的和平建設和英、美在中國和東方的帝國主義利益。因此，中國的抗日戰爭，無論在國內和國外，都贏得了廣泛的同情和支持。

在國際方面。蘇聯是中國人民的最忠實的朋友，它堅決的支援了中國的抗日戰爭。1937年8月蘇聯與中國訂立了互不侵犯條約，在財政和軍事上給了中國巨大的援助。在抗日戰爭的最後階段（1945年），蘇聯打敗了希特勒德國之後，又迅速對日宣戰，協同中國人民和同盟國軍隊共同打敗了日本侵略者。

英國和美國，由於它們在中國和東方問題上與日本之間存在着帝國主義的利益衝突，在一定程度上同意中國對日本的抗戰。不過，英、美不同於蘇聯，它們對中國人民的反侵略鬥爭，執行着反革命的兩面政策。一方面，贊助中國的抗日行動；另一方面，却和它們在西方縱容希特勒一樣，企圖利用日本法西斯侵略勢力來削弱和消滅中國和東方的革命力量。所以，在中日戰爭爆發之後（直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它們總是竭力與日本尋求妥協，希望把戰爭引向蘇聯，或者希望日本與中國兩敗俱傷，以便坐收漁人之利。就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當美國急需中國戰場給予有力配合的情況下，它在中國也仍是極力排擠人民革命勢力，企圖利用情勢來獨占中國，變中國為美國的殖民地。

在國內方面。除了一部分最反動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和其他民族敗類為日本帝國主義所收買充當了漢奸而外，整個民族都是要求抗日的。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一個民族敵人深入國土這一事實，起着決定一切的作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

但是，由於各階級經濟、政治地位的不同，在參加抗日中又表現了不同的態度。

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這是最堅決的抗日力量。他們佔了全國人口的90%以

上，是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下最受迫害的階級。因此，他們對抗日鬥爭最堅決、最積極，是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復興中國民族的最基本的力量。而久經鍛煉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革命武裝，則是這個力量的中心支柱。

以國民黨統治集團為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基本是英、美買辦集團），是抗日陣營中的頑固勢力。他們一方面要求抗日，另一方面卻極端的仇視人民，仇視抗日力量的發展。在過去長時期中，他們堅決的反對人民，反對抗日，並一心一意的要消滅共產黨。“七七”事變後，他們之所以起來抗日，這完全是被迫的。第一，由於人民對它的壓迫，使它不能不起來抗日，否則就不能維持自己的統治；第二，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對全中國的進攻直接地危害着它的政權和財產，與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此時已無法調和；第三，由於英、美帝國主義與日本帝國主義之間矛盾的發展，這種矛盾影響到國民黨統治集團對日本侵略者的態度。由於上述原因，所以在抗日戰爭爆發以後，國民黨統治集團一面進行抗日，一面壓迫人民的抗日活動。不惜採取一切手段來限制抗日力量的發展，特別是限制共產黨力量的發展，而把抗日勝利的希望寄托在外國（英、美）的援助之上。

民族資產階級和由地主階級中分化出來的開明士紳（帶有資產階級色彩的地主），則是動搖於工農革命勢力與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頑固勢力之間的一種力量，是所謂中間勢力。他們在淪陷區受到日本帝國主義壓迫，在國民黨統治區受到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限制。因此，他們願意同工農羣眾共同抗日和建立抗日民主政權；在工農革命勢力與頑固派進行鬥爭時，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參加或保持中立。但是由於他們的軟弱性和害怕工農革命力量發展的特點，使之往往動搖於工農力量與頑固派之間，在對外對內的鬥爭中，缺乏應有的勇氣和決心。

以上情況說明，中國人民的抗日救國事業，不是孤立的。無論在國內或國外，我們都有廣泛的同盟者。儘管其中有一些力量是動搖的、不穩定的、不可靠的，但却是可以爭取、可以利用的。同時，也只有團結了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才能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毛澤東同志說過：抗日戰爭的勝利，“要有三個條件：第一是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二是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國內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運動的興起。……三個條件中，中國人民的大聯合是主要的。”（毛澤東選集第二卷，“論持久戰”）這就說明了廣闊的抗日統一戰線，特別是國內的統一戰線在民族解放鬥爭中的嚴重意義。這一觀點，毛澤東同志在許多著作中，都作了反復的強調。他說：“為要克服困難，戰勝敵人，建設新中國，只有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動全民族中的一切生動力量，這是唯一無二的方針。”（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

但是，在与各种不同力量的合作抗日过程中，必須重視各种力量之間的区别，坚持无產階級的独立自主原則，象列寧曾經說過的那樣“嚴格的監視自己的同盟者，犹如監視敵人一樣。”以便防止任何陰謀破坏。

二、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形成

为了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战勝利，抗战爆發以後，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作了更進一步的努力。

“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天，党即向全國發出宣言，号召“全國人民、政府和軍隊團結起來，筑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略。”7月15日，又向國民黨送出了“中國共產党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的文件，文件中提出了三點主張：

1、發動民族抗战，收復失地，爭取民族之獨立自由解放；2、實現民主政治；3、改善人民生活。并声明我党願在共同抗日的基礎上实行下列四項諾言：1、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2、不以暴力政策推翻國民党政权和沒收地主土地；3、改組原來的紅色政府为边区民主政府；4、紅軍改名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员会之統轄。7月17日中國共產党代表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和國民黨代表蔣介石、邵力子、張冲进行了廬山談判。在这次談判中，國民黨代表承認了陝甘寧边区政府。

由于全國抗日运动的發展，我党進一步对國民黨的批評、推动和督促，國民黨政府先后公布了中國工農紅軍和南方各省的紅軍游击隊改名为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命令。9月22日，國民黨經過其通訊社發表了中國共產党中央7月15日所提交的关于宣布國共合作的宣言。次日，又發表了蔣介石承認中國共產党合法地位的談話。我党的这个宣言和蔣介石的这个談話，宣告了國共兩党統一戰綫的成立。

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成立，使整个革命形势大大的前進了一步。毛澤东同志說：“这将給予中國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將对于打倒日本帝國主义發生决定的作用。”

“尽管还有某些人（按——指蔣介石集团）还不明了这个統一戰綫的歷史任务及其偉大的前途，还在認為結成这个統一戰綫不过是一个不得已的敷衍的臨时的办法，然而歷史的車輪將經過这个統一戰綫，把中國革命帶到一个嶄新的階段上去”。（毛澤东选集第二卷，“國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

但是，問題也还是存在的：民族矛盾的加深縱使各个階級联合了起來，而固有的階級矛盾却並沒有因此而減少和消滅。團結抗战的局面，仍然包藏着極大的不穩定性。抗战开始不久，毛澤东同志就一再提出這個問題，要求全党警惕。

毛澤东同志指出：國民黨由对日妥协走向对日抗战，这是一个進步，一个轉變，是值得欢迎的；但是，对國內民众，却仍然坚持着十年來的一套：“对人民抗日运动基本上依然不肯开放，对政府機構依然不愿作原則的改变，对人民生活依然沒有改良的方針，对共產党关系也沒有進到真誠合作的程度。”（毛澤东选集第二卷，“为動員一

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這是抗日戰爭中潛在着的嚴重危險。

這種現象之所以產生，是與國民黨統治集團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反人民的階級本性分不開的。他們在人民的逼迫下實行了抗戰，抗戰開始以後，就更加強了對人民革命力量的恐懼和仇恨，集中其注意力於對人民革命力量的防范、阻撓、破壞等等方面，以期在革命變動之中保持其腐朽的統治。

由此出發，所以在整個抗日戰爭過程中，國民黨反动統治集團，始終念念不忘的要消滅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革命力量。抗戰剛開始，他們就定下了陰謀毒計，預期“在抗日戰爭中削弱共產黨五分之二”。以“借刀殺人”的辦法，要八路軍、新四軍去担负敵人后方最困難的作戰任務，企圖假手日本帝國主義的力量，來消滅這支人民革命武裝。而對日本侵略者的鬥爭，則基本上採取消極應付的態度（即使在抗戰初期一度表現積極）。並隨時準備對日妥協，在日寇對他們的財產和統治權稍留餘地的情況下，結束抗日戰爭。“八一三”日寇進攻上海前後，國民黨在一次高級幹部會議上所決定的“和必亂，戰必敗；戰而後和，和而後安。”的抗戰方針，正是他們的抗日態度、抗日政策的最好概括。

因此，抗日戰爭從其開始的一天起，國內就存在着兩條指導路線的鬥爭。一條是國民黨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抗戰路線，一條是共產黨所代表的廣大人民的抗日戰爭路線。二者爭論的中心是如何抗戰問題。

國民黨的抗戰路線認為：抗日戰爭的全部活動，必須服從一個根本目的，即無條件的保證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剝削利益和封建、買辦、法西斯專制制度。這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一切足以威脅其統治存在的政策主張和行動措施，都必須加以限制；加以取締。由此，抗戰中間，人民羣眾的力量不能發動，人民民主不能開放，人民生活不能改善。偉大的民族解放事業，只能由反人民的國民黨政府和反人民的國民黨軍隊一手包辦，廣大人民的義務則是伏首聽命，而不能有任何過問的權利。很顯然，這種反人民的片面抗戰路線，是不能引導抗戰走向勝利的，其結果，必然招致國家的滅亡。

共產黨的抗戰路線則與此相反。共產黨認為：打敗侵略者解放全中國，是中國人民的神聖權利。在抗日戰爭中，中國人民將依靠自身的力量，打碎帝國主義的鎖鏈，爭得民族獨立；同時也將依靠自身的力量，冲破蔣介石的黑暗統治，爭得政治自由。因此，放手發動羣眾，實現民主，改善民生，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則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抗戰鬥爭的根本方針或根本路線。這個路線是與國民黨的片面抗戰路線完全相反的全面抗戰路線，同時也是唯一的能夠引導抗戰走向勝利的路線。任何與這條路線相違背的打算，如：要想剝奪人民的抗戰權力，要想壓制人民的抗日活動，要想破壞人民的抗日力量等，都必須予以堅決的鬥爭。

兩條路綫的鬥爭貫徹了整個抗日戰爭時期。而堅持全面抗戰，反對片面抗戰，則是共產黨和全國人民堅定不移的立場。

三、黨的洛川會議

1937年8月，黨中央在陝北洛川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充分的分析了當時的形勢，正確的估計了國民黨片面抗戰的危險，以及可能由此發生的鉅敗、退却、內部分化叛變、暫時局部妥協等不利情況；指出黨的中心的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使已經發動起來的抗戰發展成為全面的抗戰。

會議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提議，通過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

綱領的內容如下：1.打倒日本帝國主義；2.全國軍事總動員；3.全國人民總動員；4.改革政治機構；5.實行抗日的對外政策；6.實行戰時的財政經濟政策；7.改良人民生活；8.實行抗日的教育政策；9.肅清漢奸賣國賊親日派；10.建立抗日的民族團結。

這個綱領，全面的概括了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政治主張，為實現“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的戰略任務，指明了具體的道路。因而成為我黨領導全國人民打敗日本侵略者和反對國民黨的片面抗戰路綫的行動準繩和戰鬥武器。

根據這一綱領，會議又具體的確定了下述的活動方針。

第一，放手發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使游擊戰爭擔負配合正面戰場，開辟敵後戰場，建立抗日根據地的戰略任務。

這在我軍戰史上是一個戰略的轉變（由正規戰向游擊戰的轉變）。這種轉變之所以發生，是我軍在抗日戰爭時期的特異地位所決定的。國內戰爭轉入抗日戰爭以後，由於敵友情況的變化，我們的處境是十分嚴重的：一方面，要與一個強大的帝國主義日本進行鬥爭，另一方面，還必須與一個陰險狡猾的同盟者共處。——這個同盟者與我們進行過十年的內戰，現在仍對我們懷着深刻的敵意，處心積慮的要在抗日戰爭中消滅我們。處在這種戰略夾擊的形勢之下，如何保存自己在和保存自己的基礎上有效的消滅敵人，就不能不成為我們面臨的首要問題。在這個問題上，稍有疏漏，稍有失當之處，就有被打敗和消滅的危險。正是根據這一變化，黨適時的改變了自己的作戰指導，把正規軍變成為游擊軍，把正規戰變成為游擊戰，確定了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的方針。自然，這個轉變是個非常困難的轉變，因為在形式上這是一個倒退的轉變；但是，它卻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轉變。毛澤東同志說：它關係着整個抗日戰爭的堅持、發展和勝利，也關係着中國共產黨的前途。因為只有實行了這樣的轉變，才能使我們在敵人強大的壓力和友軍的陰謀暗算之下，避開過早的和與我不利的決戰，而以有限的武裝力量（抗戰開始我們只有三萬多人的軍隊），分散在敵後廣大區域，結合分散的游擊戰爭，進行深入的羣眾工作，然後在這一基礎上擴大人民武裝，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達到堅持長期抗戰，爭取最後勝利的目的。

因此，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不僅是發展積蓄革命力量打敗日本侵略者的重要手段，而且也是粉碎國民黨消滅人民革命力量的罪惡陰謀的有力武器。

第二，在國民黨統治區，放手發動抗日羣眾運動，團結廣大人民，與國民黨的片面抗戰政策進行鬥爭，推動抗日戰爭的勝利進行。

第三，在有利于动员全國人民参加抗日的前提之下，爭取全國人民的政治經濟权利——实现民主，改善民生。并决定以減租減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農民問題的基本政策，以便發动占全國人口80%的農民的抗日積極性。

总之，我們的全部活动，必須圍繞一个中心，即放手發动羣众。洛川會議所通过的“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寫道：“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傳羣众，組織羣众，武裝羣众。只要真能組織千百万羣众進入民族統一战綫，抗日战争的勝利是无疑义的”。

为了保証上述方針的实现，會議特別強調了“独立自主”的原則。所謂“独立自主”，就是坚持无產階級的獨立性，不受蔣介石國民党的任何限制和阻碍，放手大胆的領導革命和發展革命。毛澤东同志說，这是把抗日战争引向勝利的中心一环。

第二講 为坚持全面抗战、坚持統一战綫中的 独立自主而斗争

一、两个战場的两种局面

依据两条不同的抗战指導路綫，出现了两个抗日战場的两种抗战局面。

1937年9月至1938年春天，中國共产党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相繼挺進華北、華中敌后，实行了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綫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針。平型关首战告捷，振奋了全國人心。隨即在国民党軍隊遺棄的广大國土上，开展游击战争，擴大人民武装，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从而打击了日寇的疯狂气焰，粉碎了蔣介石企圖利用日寇消滅八路軍、新四軍的陰謀毒計。到1938年夏，八路軍、新四軍先后在敌人后方建立了晋察冀、晋冀魯豫、晋綏、山东、華中等广大的抗日根据地。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行政上划分为北岳、冀中、冀热遼三区），位于同蒲路以东，渤海以西，正太、德石路以北，張家口、多倫、錦州以南之广大地区，包括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遼寧各一部。1937年9月，平型关战役之后，八路軍115师主力南下，留下2千人左右，由聂荣臻同志領導，以五台山为中心創立抗日根据地。这支武装在地方党的配合下，进行了广泛的群众工作，在放手发动群众的基礎上，部隊迅速的擴大了数倍。11月成立了晋察冀軍区，次年1月召开軍、政、民代表大会，建立了晋察冀边区抗日政权。1938年初，繼續向东發展，建立了冀中根据地。同年6月，鄧（華）宋（时輪）支隊挺進平北冀东，配合冀东7縣的抗日大起义，建立了冀东根据地。

晋冀魯豫抗日根据地（行政上划分为太行、太岳、冀魯豫、冀南四区）位于同蒲路以东、津浦路以西，隴海路以北，正太、德石路以南地区，包括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南部。1937年11月太原失守以后，八路軍129师以太行山为依托，首先創立了太行、太岳山区抗日根据地。1938年春，越平漢路，出冀魯豫平原，开辟了冀魯豫和冀南抗日基地。

晋綏抗日根据地（轄晋西北、大青山兩区）东起同蒲与晋察冀区相接，西至黄河与陝甘寧相接，南迄汾离公路，北达包头、陶林之綫，包括山西西北部及綏远东南部。1937年冬，八路軍120师進入晋西北地区，連克寧武、神池、五寨、岢嵐、偏关、河曲、保德等七縣，配合地方党領導的抗日武装和群众組織，創立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938年8月，李（井泉）支隊挺進綏远北部大青山地区，发动了綏中、綏西、綏南以及察哈尔广大地区的游击战争。

山东抗日根据地（轄膠东、渤海、魯中、魯南、濱海五区）包括津浦路以东之山东大部，河北、江苏各一部，东濒黃海、渤海，西依津浦路与冀魯豫毗連，北迄天津与冀东区相接，南至隴海路与華中根据地連接。这个根据地开創于1937年冬，当时正是国民党軍隊節節敗退，整个局势呈現一片混乱之时，泰安党組織領導平津流亡学生和广大農民群众，在徂徠山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八路軍115师進入山东，协同建立了山东抗日根据地。

華中抗日根据地，位于中國最富饒的中部——江海河漢之間，东臨大海，西屏武当，南达浙贛，北至隴海，包括江苏、安徽、湖北的大部分，河南、浙江的一部分。这个区域是在新四軍的基礎

上發展起來的，1938年1月，新四軍分江南、江北兩路進入華中敵後，6月江南部隊進入京滬鐵路兩側，建立了以茅山為中心的蘇南抗日根據地。5月江北部隊進入安徽巢湖、無為、定遠一帶地區，以藕塘為中心，建立了江北抗日根據地。（1939年以後，這塊根據地逐步擴大，形成為蘇北、淮北、鄂豫皖、蘇中、淮南、蘇南、皖中、浙東八個區）

廣大的敵後抗日根據地的建立，使敵人後方變成了抗日前綫，开辟了廣闊的敵後抗日戰場。

與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戰場的情況相反，國民黨軍隊担负的正面戰場，由於實行了片面抗戰路綫和失敗主義的單純防禦的戰略方針，結果使數百萬軍隊在日寇最初的幾個打擊之下，便遭受了嚴重的潰敗。

抗戰初期，僅華北地區，國民黨就有70餘萬軍隊，但這些腐爛的軍隊在敵人進攻面前，大部分是一觸即潰，一潰千里。“七七”事變後不到一月，國民黨就放棄了天津、北京，不久又放棄了察哈爾、綏遠兩省，僅僅半年時間內，整個華北淪於敵手。京滬前綫情況也莫不如此。上海失守後，蔣介石曾聲言死守南京六個月，結果六天即失掉了南京，並且部隊受到了慘重的損失，僅死於長江的就有數百萬之眾。

兩個戰場的兩種局面形成了尖銳的對比。

至1938年夏，在華北，以國民黨為主體的單純防禦戰爭已告結束；以共產黨為主體的游擊戰爭進入主要地位。在華東，國民黨的戰綫已被擊破，日寇正向長江流域長驅直入。至此，國民黨的片面抗戰路綫已表現不能持久；而共產黨的全面抗戰路綫却得到了全國人民的一致稱贊，“民族救星”的聲浪傳布全國。

二、民族投降主義和階級投降主義

正面戰場的失敗局面，促進了國民黨內部的動搖。在事實的懲罰下面，他們不是積極的來改變他們的錯誤路綫，相反的片面夸大敵人的強大，強調敵人裝備的優越，散布失敗主義空氣。企圖以此來開脫他們喪師失地的罪行，並為進一步的妥協投降开辟道路。

1938年5月徐州陷落以後，國民黨內部呈現了一片混亂，“亡國論”與“速勝論”，一時之中甚囂塵上。以汪精衛為首的親日派分子，強調中國武器裝備不如敵人，大叫“再戰必亡”。蔣介石一派表現略有不同——他們是“速勝論”者。從抗戰一開始，就幻想在外力支援的基礎上取得速勝，以免在持久作戰中，人民力量的發動會威脅到自己階級的安全。所以每當戰局稍微有利的时候，就高叫“決戰”，“反攻”，“半年勝利”，“一年勝利”等等，用以抵制人民戰爭的真正發動。但是“速勝論”者不相信人民力量和害怕人民力量的反人民本質，畢竟與“亡國論”者沒有多大差別，在其依靠外力取得速勝的夢想被事實粉碎之後，就不能不一轉而為悲觀失望的“亡國論”。

隨着國民黨統治集團這種動搖，“反共”投降的空氣也就迅速的上升起來。“共產黨暴動”、“八路軍退却”一類的謠言宣傳，與日俱增。陰謀策劃分裂統一戰綫，結束

抗战，实行民族投降。

这种反动倾向的发展，是带有必然性的。毛泽东同志指出：“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这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一般地说来，他们之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是为期不远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任务”）

至于中间阶层以及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急进分子，这时在国民党的片面抗战面前，则表现了迁就退让。发出了“少号召，多建议”的议论。认为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在抗日问题上，对国民党的主张（不管是正确的或不正确的），只应该积极支持，提出建议，不应当独立自主的进行抗日活动。

上述的党外情况，在党内也得到了适当的反映。以王明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从内战时期的“左”倾关门主义，抗战开始以后一变而为右倾投降主义（阶级投降主义）。从右的方面来反对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

他们抹煞统一战线中不同的阶级集团的存在，抹煞国共两党间片面抗战和全面抗战路线的分歧。认为国内抗日阵营中，没有左派、中派、右派的分别，只有抗日派和亲日派的分别，“凡抗日者皆我友，降日者皆我敌”，“抗日与否是划分友敌的主要标准”。责难毛泽东同志把统一战线中划分为左、中、右三种力量，是“模糊了统一战线的主要目标”，“会引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营垒中不应有的磨擦和分歧。不承认有片面抗战与全面抗战的对立。埋怨党不应该强调抗日战争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埋怨党不应该强调“实行民主、改善民生”的口号。认为这是“不清楚了解今天两党合作的主要原因和主要目的”，“不清楚了解对统一战线中的友党应有的态度和方针”，因而这都是“自觉的不自觉的作下了破坏民族统一战线和有利于敌寇的事情”。不仅如此，犯右倾错误的同志甚至弄到敌我不分的地步，连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阶级界限也模糊了起来，笼统的说国共两党都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的青年的总汇”。并硬说中国没有法西斯主义，再三再四的为国民党反动政策粉饰。

显然，这是一个极严重的错误，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批评的那样：这是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等看做一样的东西，忽视它们之间的原则差别的错误。这种错误，忽视资产阶级（尤其大资产阶级）不但在极力影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而且还在极力影响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力求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力求把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力求使革命果实归于资产阶级的一羣一党的事实；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一到革命同他们一羣一党的私利相冲突时，他们就实行叛变革命的事实。”（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共产党人’发刊词”）

由此，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就离开了无產階級——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根本立場，完全喪失了正确的判断事物的能力。他們在处理國共兩党合作問題中，就極力反对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所提出的“統一戰綫中的独立自主”原則和“有團結，有斗争，以斗争求團結”的方針。否認党在統一戰綫中必須坚持无產階級的独立性和領導权这一原則的嚴重意义。他們把民族斗争与階級斗争机械的对立起来。在他們看来，似乎不論何种形式的階級斗争都会有害于民族團結而不利于抗日战争。因此，就无条件的強調統一，否認斗争。錯誤的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綫”（實質上是一切經過國民黨）；要在國民黨“現有的基礎上”建立“統一的政府”和“統一的軍隊”。在軍隊問題上，主張“統一指揮、統一編制、統一武裝、統一紀律、統一作战計劃、統一作战行動”，要“打破拥軍自衛的傳統”。在政权問題上，主張“一切政权制度保持現有形式”，反对以“边区形式出面”。在羣众工作上，反对強調民主、民生問題，主張“全國範圍內成立統一性的全國領導机关，向政府（按：國民黨政府）登記，并接受政府（按：國民黨政府）領導。”把羣众工作置于國民黨的監督和控制之下。批評我們党对友党友軍贊揚帮助不夠，对友党友軍的批評缺乏審慎。特別強調“独立自主”对國民黨引起了刺激和反感，給了國民黨分裂統一戰綫的口實等等。总之，他們要把自己的一切行動限制在國民黨所允許的範圍以內，企圖以消極的讓步來維持与國民黨的联合。

这种消極退讓政策，是反馬克思主义的。毛澤东同志在批評这种錯誤時說道：“我們的讓步、退守、防禦或停頓，不論是否向同盟者或向敌人，都是当作整个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的，是联系于总的革命路綫而当作不可缺少的一环看的，是当作曲綫运动的一个片断看的。一句話，是積極的。”而“把讓步看作純消極的东西，不是馬克思列寧主义所許可的。純消極的讓步是有过的，那就是第二國際的劳資合作論，把一个階級一个革命都讓掉了。中國前有陈独秀，后有張國燾，都是投降主义者；我們應該大大地反对投降主义。”（毛澤东选集第二卷，“統一戰綫中的独立自主問題”）

在战争指導上，他們反对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所規定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根本上是游击战，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針。他們看不到党所領導的人民力量 and 人民武裝的光明前途，把抗日战争勝利的希望寄托于國民黨軍隊的正規战上面，夸大國民黨軍隊的正規战争的作用，輕視党領導的游击战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因此，要求“普遍的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陣地战，輔之以游击战的方針”。認為运动战有声有色，少打大仗，一时顯不出民族英雄的本色，降低了資格。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再次証明了以教条主义为特色的这些犯錯誤的同志，不懂得“在中國，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組織形式是軍隊”这一問題的深刻意义。正如他們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战争时期一样，把党領導的革命武裝看成是簡單的打仗的工具，根本忽視它在發

動羣衆、組織羣衆、積蓄發展革命力量方面的偉大作用。因而力圖把黨當時所僅有的三、四萬軍隊（這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中革命受挫以後留下來的最寶貴的革命財產）用之于盲目的正規戰爭。顯而易見，這種打算，只會使我黨領導的革命力量因盲動冒險而受到損失，只會幫助蔣介石達到其借刀殺人的目的，而最後把抗日戰爭引向失敗。

至于對抗日戰爭的前途的看法上，他們認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只能是國民黨的勝利，而不是人民革命的勝利。因為在他們看來，在中國這樣一個國家中，只有國民黨才是強大的不可侵犯的力量。

1937年12月，王明在他的“挽救時局的關鍵”的文章中斷言：“中國現在的实际情形是：如果國共兩黨以合作的力量和方式達到驅逐日寇出境的勝利，那麼，國民黨在實際上證明其為中國人民的民族生存而奮鬥的最大政黨，國民黨的領袖蔣先生及其他堅決領導抗戰的人物，將成為中國的不朽民族英雄，那時候，誰能違反中國人民的意志而進行推翻國民黨的鬥爭呢？”“由此可見，听信‘抗日勝利了是共產黨蘇維埃的天下’這種謠言的人，不但是對於中國的实际情形太隔膜，而且對於中國國民黨的鬥爭力量和光明前途無信心”。這一段話就充分的說明了他們是怎樣的對人民力量失去信心。

正因為如此，所以在他們的整個工作中，自始至終都不重視人民革命力量的發展和革命陣地的擴大，而集中其注意力於國民黨統治之下的合法運動，使黨的工作盡量的適合國民黨的要求。對國民黨則是“塗脂抹粉，惟恐不力”。徐州失守以後，他們違背黨中央的意志，把長江流域的工作重心放在城市，放在保衛武漢的喧嚷上面，而不是集中力量踏踏實實的去發動羣衆，組織羣衆，擴大人民武裝，建立抗日民主政權，以便保證抗日戰爭的結局成為人民勝利的結局。

此外，他們又犯了組織上的錯誤。他們漠視黨內的思想鬥爭和批評與自我批評，提倡黨內的風頭主義、自由主義；他們漠視黨的組織紀律、提倡黨內的地方主義和分散主義。不經中央同意，擅自發表宣言和文章，並拒絕中央的正確指示。他們這種錯誤的思想和行為，在1938年由王明同志在武漢負責的工作中，和1941年以前項英同志在新四軍的工作中，曾經發生了影響，因而妨礙了長江流域抗日游擊戰爭的發展和人民力量的壯大，並造成了以後在“皖南事變”中新四軍部隊的嚴重損失。

右傾投降主義分子的上述錯誤，違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階級鬥爭的原理，違背了列寧曾經再三重複過的：在與資產階級進行聯合時必須堅持無產階級的獨立性和領導權的思想。這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在新的條件下的復活。

這種情況之所以產生，是有兩方面的原因的。

第一、是黨外階級鬥爭的影響，特別是階級鬥爭的曲折發展所給予的影響。抗日戰爭以前，我們與國內階級敵人——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是處在公開的敵對狀態之中的。那時，我們的敵人對我們所施行的戰爭、屠殺和窮凶極惡的野蠻鎮

压政策，毫无保留的暴露了他們的真正面目，使他們不戴面具、毫不粉飾的出現在斗争舞台之上。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一个站在斗争前綫上的共產黨員，都能夠比較容易的認識敌人，警惕敌人，使敌人的任何陰謀詭計，在共產党人的警惕、戒备之下，及时的被揭露，被粉碎，而不至于輕易的浸蝕和毒化党的隊伍。抗战开始以后，这种情况就發生了顯然的变化，公开的敌对状态改变了，出現了联合抗日的局面。适应着这种变化，階級敌人改变了他們的策略，他們在抗战“朋友”这个字眼的掩盖之下，用一种比較伪裝的形式來向我們進行斗争。并时刻施以小恩小惠，進行引誘。正是这样，党内一部分觉悟不高和缺乏經驗的人，就降低了警惕，解除了武装，松弛了戒备。随之敌人的影响就乘虛而入，使党内一部分不坚定的分子失去方向。从而在抗战初期，出現了軍隊中的新軍閥主义傾向；政权問題上的迁就傾向；統一战綫中的投降主义傾向……等。由此可見，階級斗争的曲折性，乃是党内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列寧曾經說過：“引起工人运动參加者彼此分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一般統治階級特別是資產階級策略方面的改变。如果資產階級策略始終是單調的，或至少是經常一致的，那工人階級就能很快学会用同样單調和同样一致的策略去回答它了。”資產階級策略方面的迂回步骤，“在工人中間造成分裂，把工人的政策变成为軟弱的，始終軟弱的和朝生暮死的所謂改良运动底一种軟弱的附屬品。”（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义，“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关于这个問題，毛澤东同志也曾一再提醒全党警惕。他說：当着統一战綫还没有成为事实的时候，“左”傾关门主义是主要危險；当着統一战綫成为事实的时候，右傾投降主义往往又成为主要危險。

第二、更重要的則是由于党內的不純（敌人的任何陰謀破坏，是通过无產階級內部的不穩定分子而起作用的）。大家知道，以王明为代表的犯右傾机会主义錯誤的同志，还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战争时期就是以小資產階級革命家著称的。过去（第二次國內革命战争时期）他們急于勝利，犯了“左”傾冒进主义的錯誤；抗战开始以后，于是由一个極端跳躍到另一个極端，变成了右傾投降主义。这种由“左”到右的發展，是賦有“華而不实、脆而不坚、搖擺不定、反复无常”的特性的小資產階級分子的合乎規律的变化。自从第三次“左”傾路綫使革命遭到嚴重挫折以后，以王明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就產生了一种悲觀失望的情緒，他們認為革命已被打敗了，國民黨是不可戰勝的力量。抗战开始后，國共合作的形成和國民黨的策略的改变，進一步促進了这种右傾情緒的增長。他們夸大國民黨的力量，輕視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只看見國民黨的表面強大和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的暫時弱小一面，忽視了國民黨反动腐朽的本質和革命力量必然發展壯大的一面，因而相信國民黨超过了相信黨和人民羣眾，把抗战勝利的希望寄托在國民黨身上而不是寄托在人民身上，形成階級投降主义路綫。

階級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軍，是援助右翼營壘而使战争失敗的最惡劣的傾向。因此，在堅決的与反民族投降主义的斗争的同时，就不能不堅決的反对階級投降主义。

三、毛澤东同志的“論持久战”一書的發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

毛澤东同志領導全党与民族投降主义和階級投降主义展开了尖銳的斗争。

1937年11月，党在延安召开了活动分子會議。毛澤东同志在他所作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再次強調共产党的抗战主張和国民党的抗战主張在原則上的分歧，并說：“如果共产党员忘記了这个原則性，他們就不能正确地指導抗日战争，他們就将无力克服国民党的片面性，就把共產主义者降低到无原則的地位，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他們就是对于神聖的民族革命战争和保衛祖國的任务犯了罪过。”毛澤东同志指出：統一战綫之必須坚持，这一点是毫无疑義的；但是，在統一战綫中，是无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呢，还是資產階級領導无產階級？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則是一切問題的關鍵。他說：“我們和国民党及其他任何派別的統一战綫，是在实行一定綱領这个基礎上面的統一战綫。离开了这个基礎，就沒有任何的统一战綫，这样的合作就变成无原則的行动”。因此，“在一切統一战綫工作中必須密切地联系到獨立自立的原則。”毛澤东同志并具体規定：在八路軍、新四軍中，必須坚持党的絕對領導，拒絕國民黨派遣干部，拒絕國民黨提出的取消政治委員制度和政治工作的无理要求；在各抗日根据地，必須保持无產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制，反对國民黨進行破坏活动；在國民黨統治區，必須冲破國民黨的限制，尽可能的發動羣众的抗日斗争；在日寇占領区，必須不管国民党允許与否，放手發動獨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在对待統一战綫中各种势力方面，必須用一切努力去擴大和巩固進步势力，爭取中間集团的進步和轉变，堅決的反对頑固势力的投降傾向。毛澤东同志認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党已經取得的陣地；只有这样，才能發展新的陣地，保證抗日战争的勝利成为人民的勝利。

为了徹底地澄清党內外对抗战的錯誤認識，正确的指導抗日战争的進行，1938年5月，毛澤东同志發表了“論持久战”一書。在这一杰出的馬克思主义的軍事著作中，毛澤东同志進一步系統的分析了敌我作战的条件，战争發展的趋势，以及爭取战争勝利的根本道路。

毛澤东同志指出：“中日战争不是別的任何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和帝國主义日本之間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進行的一次決死的战争。”这个战争，既區別于性

質不同的其他戰爭，也區別於性質相同的一般的反侵略戰爭，而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進行的一次特殊戰爭。

根據毛澤東同志的分析，中國抗戰具有下述的特點：

第一、‘它是一個弱國對強國的戰爭——這是中日雙方的社會性質和生產水平所決定了的。日本是一個帝國主義強國，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國，無論在軍事力量、經濟力量和政治組織力量各方面，中國都遠不如日本。這種強弱對比的形勢，決定了中日戰爭之不可避免，決定了中國抗戰的艱苦性和持久性。同時這種客觀形勢，還使我們存在着亡國的危險。忽略了這一點，就要犯主觀主義的錯誤。

但是，可否由此得出結論，說中國根本沒有勝利的希望呢？不能的。除了敵強我弱的條件之外，我們還有其他的有利條件。這就是：

第二、我們進行的戰爭，是在進步的時代進行的進步的戰爭。毛澤東同志指出：時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日本雖強，但已頻於死亡。“從社會行程上說來，日本已不是個興旺的國家”，而是一個趨於沒落、死亡的帝國主義國家，內外矛盾的沖擊，已使它處在崩潰的前夜。為了逃避崩潰、死亡的命運，它不惜發動了大規模的侵略戰爭，而建立在法西斯主義基礎上的戰爭所帶來的破壞和災難，卻反轉來激化了它的內外矛盾，加速了它的死亡進程。——戰爭的反動性、退步性和帝國主義沿着下坡路行進的這一歷史規律，註定了日本侵略者死亡的命運，這是無可逃避的。因此，它所賦有的一切優勢，都是暫時的。這種優勢，將依其戰爭本性而發生變化。在中國方面則完全不同，我們所進行的戰爭，是擺脫奴役、爭取解放、把社會推向進步的戰爭。這個進步性、正義性，喚醒了本國人民的團結，贏得了世界人民的支持，激起了敵國人民的同情。而更重要的是：這個戰爭是處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這個歷史時期。在這個新的時期，中國“已經不是完全的封建國家，已經有了資本主義，有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有了已經覺悟或正在覺悟的廣大人民，有了共產黨，有了政治上進步的軍隊即共產黨領導的紅軍，有了數十年革命的傳統經驗，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十七年的經驗。”這一切新生的因素，加上我們的事業的進步性和正義性，就決定了中國必然走向發展、進步和勝利，而不是相反。這一趨向，同樣是事物的本性即事物運動的規律所決定了的，是任何力量都阻擋不住的。

還不止此。

第三、我們進行的戰爭是多助對寡助的戰爭。

第四、我們進行的戰爭是大國對小國的戰爭。

這一切，就決定了戰爭的結局——中國將走向勝利，而不是走向滅亡。即使敵人挾其優勢力量占領了我們許多土地、城市、交通要道，也不足以改變這個方向。中國人民